

古世仓 吴小美 著

老舍与中国革命

LAOSHEYUZHONGGUOGEMING

民族出版社

老舍与中国革命

古世仓 吴小美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与中国革命/古世仓,吴小美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11

ISBN 7-105-07317-9

I. 老... II. ①古...②吴... III. ①老舍(1899~1966)—
人物研究②老舍(1899~1966)—文学研究

IV. K825.6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52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7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1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71734)

“老舍与中国革命”的研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作者把老舍放置在“作家与革命”这一中国现代作家最基本的生存现实的比较视野中，在对不同类型作家与革命的不同关系及命运的比较研究中，在文学史层面深入认识老舍及老舍文学的价值，揭示了老舍精神世界与中国革命进程的复杂关系。

责任编辑 李志荣

封面设计 金 一

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项目 ◎ 兰州大学“萃英计划”项目

目 录

绪 论：“大时代”、革命、作家

——中国文学的百年话题 (1)

第一节 “大时代”：智者的焦虑与勇者的承担 (1)

第二节 作家：革命洪流中的“文学工作者” (7)

第一章 人、文化、社会的多重命题

——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革命(上) (14)

第一节 宿命：作家与革命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简论 (15)

第二节 多重命题：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类型简论 (20)

小 结 革命与作家：同一、分歧与建构 (29)

第二章 革命：政治的与文化的

——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革命(中) (32)

第一节 文化革命的一些重大命题 (34)

第二节 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曲折互动 (44)

小 结 暧昧与清醒：合理性与现实性 (51)

第三章 政治的询唤与作家的认同

——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革命(下)…………… (54)

第一节 询唤与认同:复杂而又单一的群象…………… (57)

第二节 老舍对革命的认“同”:追随、追赶与不理解…………… (67)

小 结 夹缝中:革命化的进程…………… (85)

第四章 人格建构与文化革命

——老舍与中国革命的认同方式(上)…………… (87)

第一节 革命时代的人:文化人格建构…………… (88)

第二节 直面苦难与文化批判…………… (98)

小 结 现代知识者的精神突围…………… (105)

第五章 人本—民本伦理

——老舍与中国革命的认同方式(中)…………… (108)

第一节 “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 (109)

第二节 市民知识者精神气质的表现…………… (119)

小 结 人本—民本伦理:生存是天,民为邦本…………… (129)

第六章 国民—子民心态

——老舍与中国革命的认同方式(下)…………… (133)

第一节 孤高意识 子民心态 独立不倚…………… (134)

第二节 国家至上 追赶时代…………… (146)

小 结 追赶时代:自信与自卑…………… (155)

第七章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老舍文学的创造及启迪 (159)

第一节 伦理文化型作家：“复杂的枝叶”

与“坚硬的果实” (161)

第二节 写出属于自己的生活与生命的本真形态 (174)

小 结 “以心灵为原动力”的文学创造 (179)

第八章 在新时代的熔炉和炼狱里

——碰死在了所讴歌的理想上 (184)

第一节 万川归海：新生活、新秩序 (188)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老舍之魔与老舍之死 (195)

小 结 生于忧患 死于忧患 (204)

附录 对近十年老舍研究的反思 (211)

参考书目 (222)

绪论：“大时代”、革命、作家

——中国文学的百年话题

20 世纪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

革命是中国 20 世纪最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复杂性的实践，是 20 世纪中国人生活的根本时代环境。以人的生活状态与生命价值为关注对象的文学和它的创作主体，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它的有机构成。作家与时代、革命是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文学绕不过的沉重话题。

“跨越东西方文化的百年老舍”与同样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一百多年的中国革命，是我们认识 20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认识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认识我们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时代的文学所须面对的重大客体世界。

回首百年，“老舍与中国革命”只是我们面对对象世界时不得不去掘开的历史沉积的一个层面。但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老舍，中国革命，仍然如同两个大小不同的球体，既相互映现着彼此斑驳的身姿而又程度不同地属于那另一个存在者。老舍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是一种老舍现象，又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现实意义。

第一节 “大时代”：智者的焦虑与勇者的承担

“大时代”是鲁迅对 20 世纪中国所处时代环境的一个极有意

味的描述,这时的中国如同处于疾病“极期”的病人,存亡悬于一线。国家、民族的危机,呼唤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揭破黑暗、担负民族兴亡的人。这是一个需要大智大勇也真正产生了大智大勇的时代。智者的焦虑与勇者的承担,是一个时代张扬的生命热力。

焦灼的现代忧患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意识。中国现代文学忧患意识的核心是民族救亡与民众启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从它的开端期就形成了放眼世界,在新的世界视野中关注民族命运,在民族救亡立场上启蒙以开发民智,重塑民族灵魂,建构现代精神的新传统。现代中国国运的艰辛使民族的现代启蒙呈现着极其复杂的状况,立人以立国的路径因此而显得曲折复杂。实际上,从近代以来,中国历次重大的社会政治运动无论其对国家近代化的贡献大小,都具有民族救亡和民众启蒙的意义。我们在这里突出现代忧患意识,是因为一段时期以来,论者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淡出这一重要命题。而20世纪的现代忧患意识又是紧紧围绕着启蒙与救亡的具体实践衍生、发展、相互消长的。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与救亡其实也都是革命的一翼。救亡是革命,启蒙也是革命的派生。我们在思考启蒙与救亡时,就要同时思考它们与革命。

直到今天,“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受到全国上下一致首肯与欢迎,深入思考如何使“以人为本”不至于停留在一个外在的口号,而要细化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终极价值观,启蒙仍是不能就此断裂的。它们都不断地表明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不得不改变。

动荡的时局不断动摇着旧制度、旧秩序的合法性,也在不断推动着新秩序的构建。各种革命性的实践及其宣传、启蒙也都因此而具有了多重的“解构”与“建构”功能,而且因为生活方式改变过

程的复杂性和革命运动的迫切性,这些革命性的实践几乎无例外地都要推进到反指己身的阶段并不得已地使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使得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真诚与敷衍、信仰与投机等等转瞬易位、混沌莫辨,也使得今日革命的有限成果和今日的风云人物转瞬成为明日黄花。这形成巨变时代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特有的激昂和悲怆。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来审视时,它的根本状貌依然清晰可见。在这一历时性过程中形成的诸种思想,又作为基本的思想内容传承于后来者共时性的思想中。中国革命既是这一启蒙——救亡的里程所不断呼唤出的一种结果,也使启蒙在中国真正借政治革命之力而不断走向深入。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启蒙与革命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焦灼的现代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历史特征进一步的和更明晰的直接诉诸思想、精神和情感的表现形式。

思想、精神和情感的表现形式离不开语言。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在思想方面,即使在最基本的文学语言问题上,追求思想、表现忧患意识的特征也极其明显。中国现代文学始于文学语言的再造,这一选择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中国新文学语言的再造,本就包含着重要的思想内涵。一是基于西方诸国民族文学的形成大都始于现代民族大众语言创立的“世界”经验,这是欧洲启蒙运动发展深入和启蒙文学的普遍特征和基本经验。二是基于现代民族文学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中异时而同调的民族启蒙和民族精神建构的宏伟历史抱负。三是基于现代民族文学共同的以广大民众为启蒙对象和读者对象的现实需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出古典传统,在相异的时空环境中取法于西方民族文学近现代进程、建设中国现代民族文学的重大抉择。虽然这一进程也一般地发端于诗体文学,但真正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传统的是散文文学特别是

小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诗国”而言,正如世界性的前民族文学时代诗体文学居于主流地位的一般状况,新的世界民族文学真正形成文体优势因而显示出思想优势的只能是散文文学特别是小说。这一工具再造的本质意义是凸显新文学的现代精神,是语言其表、精神其里的工具再造过程。从近代梁启超在“新民”意义上提出“文学界革命”和“小说救国”论以来近代白话文学的各种试验,到“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论”的白话新文学的创建,其精神枢纽都确立在“制造中国魂”、“改造国民性”上,而其真正的现实考量都直指民族救亡与民族新生。新文学在注重发掘人的灵魂、表现人的命运这一文学的主题时,始终牵系着民族国家振兴的政治意识。建立在启蒙理性上的对于国人灵魂与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于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标识。这也是中国现代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事业中真正的勇者的承担。

“启蒙的基本任务和政治实践的时代中心环节,规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因而思想性始终是对文学最重要的要求,顺便也左右了对艺术形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的基本要求。”^①中国现代文学在忧患意识驱动下的民众启蒙,其核心是国民精神的新旧置换。这使世纪初的现代启蒙志士在寻找和发掘改造国民精神的现实基础即“国民性”时,探索其根源而将视点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将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劣势看做是文化竞争的失败。这也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的国民性检讨与文化批判的思维路径和“改造民族的灵魂”的总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5)。

主题。而作为这一思维路径和文学总主题的基础,是“人的发现”和“乡土性中国的发现”。“人的发现”使新文学表现的人物具有了外设或内在的新旧冲突、自我冲突的文化心理——精神结构;“乡土性中国的发现”使新文学表现的整个客体世界都具有民族文化的象征性。而且正是基于乡土性中国的发现和因此而更加深入的人的发现,使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步调与中国革命“发现中国”的进程在思维方式、逼近生活的程度和文学对生活及人的精神、灵魂的追问等方面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这形成新文学主体性的极致张扬,形成新文学思想大于形象的整体状貌,形成新文学参与民族历史进程、参与中国革命的亢进姿态;也使新文学基本的国民性检讨与文化批判的思维路径和“改造民族的灵魂”的总主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在曲折、迂回和严峻的考验中始终得以持续地改塑和拓展。中国现代文学始终与中国革命保持紧密的关系,现代文学一直承载着过于沉重的非文学任务,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工作者不可忽视、也逃避不了的现实。

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超出旧文学传统的创建和发展,在中国现代历史视野中来看,是作为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一翼或精神前导而存在的;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来看,又是真正作为全新的中国现代“民族文学”而创建和存在的。它既作为上承近代白话小说而创造性地改变了传统小说格局的“现代性”文学而存在,^①也作为研究者所说的参照——价值系统“他者化”的现代性文学而演变。^②这两种基本观点都在不同视野中勾画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特征和价值诉求,为我们准确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民

① 参见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 参见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载《文学评论》,2002(6)。

族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视角,基本确立了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门类的经纬度。但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小说还是作为现代民族文学而发展,“他者”只是鲁迅所说的借来煮自己肉的文明之火。在现代中国的大问题前,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所言,“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因此,在“现代中国”这样一个开放的视野中来看,应该说,中国现代小说尤其是直接以乡土人生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在本质上是意义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形态。在新文学的发展演变中,“乡土性中国”在现代小说中的意蕴流变,非常突出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显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对文学自觉与不自觉的整合状况。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小说中以所谓“乡土性”或“民族性”为内核的“乡土”,实际被还原或视同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本质形态;作家对“乡土性”的反映或表现,在创作者和批评接受者两方面都常常被看做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本质性认识,是鲁迅所认可的“广义的象征”。对社会生活的“本质性认识”正是启蒙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特征。这既能从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得到梳理勾勒,也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中的实践目标和实践基础。^①应该说,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历史的众多问题和现象,反映的是在一个民族历史的“大时代”,中国现代作家、至少是其主流部分一种共同性的焦虑和承担,是一种智者的焦虑与勇者的承担。

在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忧患意识的形成、文学语言的再造、和对

^① 古世仓:《中国现代小说“乡土”意蕴的流变与中国革命》,载《兰州大学学报》,2003(5)。

于文学而言更根本的人的发现及乡土性中国的发现等基本问题的提出、新文学传统的开创等方面,有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先驱人物。许多后继者又使这些基本问题和这一新的传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传承,衍化为新文学洪波激荡的潮流。老舍是这一潮流中著名的后继者之一。他在新文学中的出现,既以现代满民族意识扩大了新文学民族忧患意识的范围,也以纯净的现代白话语言极大地推进了新文学在语言上与民众的接近,以其对于现代北京中下层社会深入广泛的表现而扩大了新文学的表现领域和读者范围,以其满含着泪痕悲色的幽默丰富了新文学的审美情感、也加深了新文学文化情感上的焦虑悲怆。老舍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基本问题的深入表现和创造性拓展方面,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精神和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方面,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思想、行为、创作理所当然地表现出的智者的焦虑与勇者的承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革命史上一道夺目而警世、醒世的风景线。这是本书立论的一个基本点。

第二节 作家:革命洪流中的“文学工作者”

启蒙理性与忧患意识使中国现代新文学将自己的文学使命自觉纳入中国革命的整体事业之中。这种“岗位意识”使现代新文学作家不得不将自己的文学事业定位在革命洪流中的“文学工作者”的事业这一基点上。

在一个追求急剧的变革的时代,中国新文学突出的忧患意识和作家主体性的极致张扬,使新文学的思想表现相对于艺术形式追求对作家而言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吸引力。新文学的思想表现与艺术形式追求,又都被纳入“人的发现”与“乡土性中国的发现”的宏

观结构之中。这使中国现代新文学作家在主观上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规定了发现和表现时代特征、发现和表现这一时代的人的精神世界以探讨时代缺陷和民众精神痼疾、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宏大叙事模式。新文学对文学消闲趣味的极力排斥和不断以论说施以打击，正是这种忧患时代的客观需要与主观意愿的表现。这不是什么派别的作家和论者凭一己的好恶褒贬所能另作定位的。这形成了中国现代新文学作家突出的“岗位意识”和来自“五四”时代的不容受批判者讨论和答辩的自信与专断。这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情结”。历史进化论的时间意识是维系这一思维方式的内在逻辑。追求变革与革命，表现现代作家面对急需变革的现实、举步维艰时的焦灼精神状态和怒愤傲烈的悲怆情怀，呼唤更加猛烈的风暴冲击扫荡板结僵死的生命状态以及生存环境的激流式的情绪宣泄等等，形成了现代新文学情感、情绪上与中国革命的深层勾连，这同样又是历史（包括文学史）所必须承认和尊重的。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类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农民和知识分子。”^①这两类形象之所以为新文学格外置重，除了新文学作家基本上是来自乡土性社会的小市镇而又经历了现代文化精神洗礼的知识分子这一主体原因；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表现，直接地关联着新文学“乡土性中国的发现”和“人的发现”这两位一体的“发现中国”的枢纽。在现代中国，没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首先觉醒，就没有“人的发现”，也就不会有更深入的“乡土性中国的发现”。而没有“乡土性中国的发现”，“人的发现”就很难真正深入，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只能成为没有时空

^①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5）。